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从周树人到鲁迅

张永泉 著

6
ZAI LISHI DE
ZHUANZHEDIAN
SHANG

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永泉 著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从周树人到鲁迅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张永泉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5

ISBN 7-5039-1998-1

I. 在… II. 张… III. 鲁迅(1881~1936) - 人物研究 IV. 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342 号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

作 者 张永泉

责任编辑 蒋爱虹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yeah.net>

E-mail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1998-1/I·863

定 价 21.6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性格探源	(40)
第一节 童年的记忆	(40)
第二节 在理性中升华	(60)
第二章 早期思想悖论	(76)
第一节 尊个性而张精神	(77)
第二节 掊物质而张灵明	(85)
第三节 任个人而排众数	(97)
第四节 恃智力以辟生路	(107)
第五节 早期思想的双重效应	(116)
第六节 天地观与鲁迅早期文化思想	(125)
第三章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143)
第一节 1917:鲁迅思想的伟大转折	(144)
第二节 文化选择的历史性转变	(159)
第三节 域外文化选择的历史性转变	(173)

第四章 走向成熟之路	(187)
第一节 与封建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193)
第二节 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232)
第三节 立足本土,放手拿来	(254)
第五章 鲁迅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	(281)
第一节 鲁迅文化批判的总体向度	(284)
第二节 历史使命与特定策略	(291)
第三节 韧性精神与悲凉情怀	(308)
附录一 走向鲁迅的本体世界	(315)
——评《鲁迅和中国文化》,兼谈鲁迅研究的新路向	
附录二 新世纪的鲁迅研究	(334)
后 记	(351)

绪 论

凡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人类历史上都有只属于他自己的坐标点。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而存在,达尔文作为生物进化论的发明者而名世,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发现者并因而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而永远载入人类史册……这就提示人们,要了解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必须要找准那只属于他的历史坐标点。这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关节所在,是从存在论角度寻找历史人物之本体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找准这一特定的历史坐标点并不像上面所说的这样简单,它不仅要求研究者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还要对历史人物何时成为及何以成为这一角色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刻的揭示。本书的任务,就是以这一认识方法为指导,去追寻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去寻找历史坐标中那只属于鲁迅的方位。

八十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鲁迅进行了不尽相同的历史角色定位。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鲁迅是伟大的文

学家;在大多数鲁迅研究者的笔下,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而在政治家的眼中,鲁迅则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革命家。应当说,这不同的论断都自有其一定道理,在鲁迅身上都能找到一定的依据。新时期以来,随着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鲁迅的历史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他的文学成就被人们看得更为清楚,他的思想家性质也变得更为凸显。但是,分歧也依然存在。同样认为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不同的研究者却对他不同时期的思想有不同的看重。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特别看重鲁迅早期的思想,认为他留日时期就已确立了一个以“立人”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五四时期的思想只不过是早期思想的延伸。毋庸置疑,立人主张在鲁迅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思想的主干。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做着立人的工作,确切地说,是改造旧有的国民性,以促进国人的新生。但我却认为,鲁迅当时只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立人的思想主张,而并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立人思想体系。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国民性“疲茶卷挛,蛰伏而无动”^①,“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②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没能找准改造国民性的突破口。鲁迅当年和许寿裳探讨国民性问题,他们常常谈起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回忆说: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② 《坟·摩罗诗力说》。

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和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①

应当说,鲁迅和许寿裳当年的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第三点,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至于第三点,自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两次奴于异族,确实是造成国民性卑怯、巧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他在国民性解剖和批判中,曾反复指明这一点^②。特别是他的晚年,接连写了《儒术》、《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之余》等一系列文章,揭示“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③。然而同他后来全部的国民性解剖和批判比较起来,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他后来的国民性解剖和批判认为,两次奴于异族,只不过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一个原因,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更重

①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

② 鲁迅在《华盖集·通讯二》中说:“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③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要的原因,中国家族制度和礼教所造成的原因,中国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政治压迫所造成的原因。十年沉默后他重新提笔的第一篇文字,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接着他便从各个角度对家族制度和礼教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批判,并以此为中心,将解剖刀指向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他指出长者本位的父权制度使子女“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终日“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①因而造成人性的“凋落萎缩”^②;“妇者服也”的节烈观念使女子自己认为“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③。他指斥中国人的“自大与好古”,这自大不是“个人的自大”,而是“‘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④,好古则是好“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等等所谓“国粹”。而这些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⑤。他批判中国人的“威福、子女、玉帛”思想,指出这是“人类中的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⑥他鞭挞中国人“瞒和骗”的文化心理,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

① 《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②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③ 《坟·我之节烈观》。

④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⑤ 《热风·随感录四十二》。

⑥ 《热风·五十九“圣武”》。

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①。他抨击中国人严格的等级观念,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②。正因为中国有的只是这种奴才式或盗寇式的反抗,反抗者心中没有理想的光,所以,即使“乘机”达到了目的,也还是把自己置于被别人“他妈的”的地位。这就使得中国的历史只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种状况的循环,使得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是安排“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③。……这些解剖和批判,显然都不是针对两次异族统治,而是针对中国整个邦国家族之制,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看来,正是这一切,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国民性,因此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④。由此不难看出,五四时期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同早期相比,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确切地说,是重要的深化。留日时期,他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五四时期的高度,

① 《坟·论睁了眼》。

② 《坟·论“他妈的”》。

③ 《坟·灯下漫笔》。

④ 《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他还没有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切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还表现出明显的眷恋、维护的倾向。

十几年来，我在研究中一直在阐发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认同，但同时也受到某些研究者的质疑。最近就接连看到两位研究者与我相左的论述。一是近年来我很看重的一位研究者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一些研究者认为，鲁迅的这一思路反映了他青年时代受章太炎影响的思想局限，他五四时期全然改变了这一思想路线，只存“取今”而舍弃“复古”，表现出彻底地反传统。在我看来，这种认识不符合实际，如侯外庐先生所说——

鲁迅是受业于章氏的弟子，他并没有“谢本师”，在他的全集之中对章氏没有发现一句不敬的话，相反地他继续着章氏的研究路径，是铁案如山。

鲁迅承续章太炎的显在表现，是几乎贯穿他一生的古籍整理和历史小说创作，其潜在表现则渗透在他的大量杂文和现代小说创作中，对此，本书的不少章节有具体的分析与说明。这又反映出鲁迅与章太炎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章太炎也“取今”，但仅作为一种潜在参照，其目的在于“复古”以追寻民族“固有之血脉”，但离开了“取今”这一参照，他的“复古”将成为泥古不化而失去意义。鲁迅承续章太炎而有“复古”，但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潜在参照，他重在“取今”，以创造现代新文化；但舍弃了

民族“固有之血脉”的潜在参照,他的新文化创造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一步说,鲁迅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所以较之同时代人更为彻底,其原因不仅在于他充分吸取了近现代“世界之思潮”,而且在于他深刻地把握了民族“固有之血脉”,表现出由“取今”与“复古”这两方面的双重作用,而形成的在人类学与民族学双重意义上的对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思考与变革。

另一研究者最近发表的谈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的专文则将问题深入了一步。他认为把鲁迅早期的复古倾向理解为喜用古字、喜作怪句子等等,或者只是把它与章太炎、邓实等的国粹主义倾向相比并,虽然具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失之肤浅,远没有揭示出鲁迅式复古倾向的实质所在。鲁迅式复古倾向有一个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背景,民族主义的内在冲动,含蕴了鲁迅当时之所以具有文化复古倾向的全部奥秘。不仅如此,对于鲁迅式复古倾向的确证,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弄清他到底要复苏“古”中的哪些部分,抑或复古倾向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并且,在此之上,阐明复古倾向在鲁迅那里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指向?他的结论是,鲁迅复古倾向的首要内容,是对 20 世纪初期由于一些知识分子“醉心欧化”而造成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反拨,是对一种自信的民族主义文化精神的张扬。鲁迅复古倾向的另一内涵,则是寻找中国文化的本根,为中国人生命力日见沉沦的历史找到一个原初的基点,以自觉接续远古的那段历史——生命力四溢的历史。这是鲁迅复古倾向的主要话语语境,是鲁迅式复古倾向的核心所在,也

是鲁迅个性文化建构的最初动因。

探寻事物的本质以追求研究的深刻,这是每个研究者所向往的,但这种深刻必须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我们谈论鲁迅早期的复古倾向,离不开两个客观实际,一是鲁迅自己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有关论述,二是鲁迅的有关文本。根据鲁迅早期的文章喜欢用古字、作怪句子来论定他的复古倾向并且把它和章太炎的国粹主义倾向联系起来虽然被认为失之肤浅,但我还是不能不由此谈起,因为这是鲁迅自己的论述,是最为可信的证据。鲁迅自己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论述并不多,而且大多不是专门谈论,因而说得十分简略,往往是一笔带过。为了避免因“摘句”而造成的断章取义或各取所需的弊端因而影响对问题的准确把握,先将鲁迅的有关论述尽可能详细地录下:

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①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

^① 《呐喊·自序》。

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①

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铎”的最初的介绍，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

^① 《坟·题记》。

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①

不难看出，鲁迅所说的他当年的复古倾向，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而且主要是受章太炎的影响。对此，周作人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他当年在日本到“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几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但是我读汉文译的圣书，白话体是不必说了，便是用古文写的，也总是觉得不够古奥，不能与佛经相比。佛经本来读得很不多，但那时已经读到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这中间实在很有一段距离，我的野心便是来弥补这个缺憾。但是，天下事不可预料，等我学了几年，回到本国来之后，复古思想慢慢的改变了”^②。这里所说的“改变”的时间比较模糊，但参看周作人的其他文字可以知道，这种语言文字的复古倾向在他回国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改变。周作人 1911 年 9 月从日本回国，于 1913 年 4 月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文，同时在绍兴县教育会任职，此间一共四年时间，直到 1917 年 3

① 《集外集·序言》。

② 《知堂回想录·八——学希腊文》。

月离开绍兴北上为止。在绍兴县教育局,他曾主办《绍兴县教育局月刊》和《绍兴教育杂志》。他回忆说:“我们办教育杂志,现在回想起来也有许多好笑的事,文章是用古文,那是不必说了,起初几期还是每句用圈断句,等到后来索性不断句了,理由是古文本不难懂,中国人的义务本应该能读懂古文的文章,所以没有加圈点的必要。这主张简直有点荒谬了,复古到了极端,这便与清朝的江声书小札或购物开账用篆文差不多,现在这种实物已经找不到,如能找出来看看,那一定也是好玩的吧。”^①

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援引鲁迅、周作人的论述,只是为了明确一个事实——鲁迅在留日时期有着明确的复古倾向——语言文字上的复古倾向。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将问题深入一步,探讨这种倾向的本质内容。还是要援引鲁迅的有关言论,看一看鲁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针对守旧派“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者也”的论调,鲁迅写了《现在的屠杀者》,指斥他们“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②。这里,鲁迅从时间观的角度揭示了守旧派侮蔑白话文行为的本质,指出他们这样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摧残和毁灭。

① 《知堂回想录·九七·在教育界里》。

② 《热风·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1925年7月,章士钊恢复《甲寅》周刊,其目的之一即是提倡古文。一位读者从中预感到可能又要有一场文言白话之争,因此写信给鲁迅。鲁迅在复信中对章士钊的文章进行了评估,指出章的文言功底“陋弱可哂”,并下断言说:“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讠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①这里,鲁迅又把鼓吹文言文视为复古倒退行为。

1926年5月,鲁迅写回忆性散文《二十四孝图》,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行文中他又一再强调:“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其倾向之鲜明,感情之强烈,只能出自他的笔下。何以如此?就是因为他看来,“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这里,鲁迅依然是从关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文言与白话之争的。

1926年11月,鲁迅写《坟》后记。因为《坟》中收了早期用文言文写的几篇文章,而恰巧当时又有人鼓吹要做好白话须

^① 《华盖集·答KS君》。